

# 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

——评普希金的创作道路

杜 嘉 蓁

(一)

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思潮与文学体裁有着一定的联系。在浪漫主义时期,诗歌显然是最重要的文学体裁,但在进入现实主义时期之后,散文,特别是小说占据了首要地位。许多作家最初都写过诗歌,而许多诗人到后来则转向了散文和小说,其中年龄无疑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作家的经历越益丰富,视野越益开阔,思想越益成熟,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热情、幻想、感受、冲动逐渐冷静,变为成年时期的观察、认识、分析、思考。从感情走向理智是人生的自然规律,在创作上则表现为从诗歌到散文(包括从诗体到散文体的戏剧创作)的发展趋势。就此而言,如果说具有浪漫主义性质的诗歌代表着人类的青春时期,那么具有现实主义性质的散文和小说就代表着人类的成年时期了。但是,对于许多终生从事诗歌创作的“纯诗人”,这又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年青的抒情诗人到成年时往往会转向叙事诗的创作,他的日渐成熟思想和认识会使他产生这方面的强烈愿望,而叙事诗实际上正是从诗歌到散文,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形式,这个发展历程在普希金的创作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证实。

普希金作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作为俄国的“一代诗宗”的地位是无可否认的;然而,如果仅仅将普希金看作“俄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十二月党人的诗人”,“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诗人”,如果仅仅将《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诗体小说作为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作,终究不免令人感到遗憾,因为正是在这部“诗体小说”之后,普希金才以《别尔金小说集》,《上尉的女儿》为俄罗斯文学推开了现实主义散文的大门。但在文学史上,人们往往或多或少忽略了普希金散文的重大意义,甚至完全抹煞了普希金现实主义散文的成就和发展。别林斯基曾经就普希金的童话诗和长诗《安济洛》(1833)判断,认为普希金“到底已经不存在了”,并在1835年果戈理的《小品集》与《密尔格拉德》出版后,将果戈理推为“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然而此时普希金不仅健在,而且正在创作着他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上尉的女儿》;高尔基后来批驳了将果戈理当作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奠基人的观点。可是时至本世纪八十年代,竟然还有人认为普希金的“波尔金诺之秋的光辉成就对普希金的创作发展说来过于急剧”,甚至是“灾难性”的,此后诗人的创作就进入了“老年”或“晚年”,“在思想方面来说,他似乎走完了人生的全部历程”<sup>①</sup>。这无异于说普希金已经完

<sup>①</sup> 引自苏联《文学问题》1979年第6期II·列卡托夫为纪念普希金诞辰180周年而写的《这是发展中的俄罗斯人》一文。

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将再也无所作为。从而认可了丹特士那颗罪恶的子弹。然而，普希金毕竟只生活了三十八个春秋，他夭亡在生命和创作最旺盛的年华，他的生活和创作远远没有达到自然的结束，甚至远远没有达到“晚年”或“老年”；而是刚刚开始一段新的伟大的历程，刚刚以强健、有力的脚步走向新的未来。如果不是那只罪恶的黑手，那么必将出现整整一个现实主义的普希金，散文的普希金，前途无量的普希金。

同样，我们也不能同意“无论是谁都不象普希金那样受周围生活影响如此之少”，“普希金的变化本身正质上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年龄上’的变化”<sup>①</sup>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将普希金的创作发展主要归结为诗人的内在因素（或者说是“才华”、“天赋”）的自然发展，而外部生活事件只是起了“伴随”，“支持”和“提供养料”的作用。我们也认为普希金的创作有着“少年”，“青年”和“成年”时期，然而，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我们认为普希金的创作及其发展恰恰与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文学思潮的发展，以及与普希金的环境和生活道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普希金来说，这些不单单是从外部给他“提供养料”，而是溶入了他的内心，不断地形成了他的新的素质，从而使他从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逐渐变成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可惜的是，这个变化并没有最终完成，在新的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这位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创始人只走完了一段初期的旅程，但决不是进入了“晚年”或“老年”，更不能认为他在思想上已经“走完了人生的全部历程”。

## （二）

对于诗人和作家创作道路的研究，一般都与他们的生活经历结合在一起。同样，文学史中也往往把普希金的创作分为：少年时期（包括皇村时期，1813——1817）；彼得堡时期（1818——1820）；青年时期（南方流放时期，1820——1824年秋季）；成年时期（米哈依洛夫斯克时期，1824年冬季——1826）；莫斯科与彼得堡时期；（埃尔兹姆鲁的旅行，1829年3—9月）；转折时期（波尔金诺之秋，1830年9—11月）；晚期（1830—1837）。这样的分期，即遵循所谓“年龄上的变化”。然而，如果我们从文学创作的性质和特点来考察，则可以把普希金的创作历程归结为：浪漫主义时期（1813——1820），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前期（1820—1824），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后期（1825—1830），转折时期，即波尔金诺时期（1830年9—11月），这段时期从总的创作性质看，也可以归入前一个时期，最后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初期（1830—1837）。

普希金的前期，亦即他的少年时期，一共创作了抒情诗246首，叙事诗《鲁丝兰与柳德米拉》（1817—1820）和两首未完成的长诗：《童僧》（1813），《波瓦》（1814、1822），以及散文体小说《娜金卡》的片断。

普希金踏上文坛之时，正值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整个国家洋溢着欢乐、喜悦和自豪感，人们充满着渴求国家进步、强盛的爱国热情和要求改革农奴制的愿望，而亚历山大一世则骄横不可一世地开始从开明走向反动，从而使国家从鼎盛走向腐朽，但这种现象此时还初露端倪。而文学，作为社会思想和精神的表现，正从同十九世纪初期古典主义、感伤主义，以及与感伤主义一脉相承的消极浪漫主义的热烈论争中开始进入积极浪漫主义的发展和兴盛时期。它主要表现为对民主性和民族性的追求和争取自由的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正

<sup>①</sup> 引文同前。

是在这些方面，普希金以其天赋才华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的风貌。

皇村时期最能体现普希金本人和时代精神的作品，应当说是充满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激情的《皇村忆古》（1814）和歌颂青春、爱情、欢乐的《安纳克利昂的坟墓》这样的诗。对彼得堡时期包括自己在内的贵族生活，普希金后来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中，作了充满愉快的讽刺和幽默的追述。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在“俄罗斯的忧郁病”的笼罩下，普希金更是直言不讳地写下了《自由颂》，《致恰达耶夫》，《乡村》这样的诗，表达出反对专制制度和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与青春的勇气和精神，因而成了十二月党人的歌手。同时，童话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连同它的成熟性也都体现了十二月党人的精神。不仅如此，这首长诗还说明普希金已经摆脱了早期西欧文学的摹仿，找到了使文学走向民族化的道路，因而茹可夫斯基才由衷地承认他是“成功的学生”，自己是“失败的老师”。实际上这正是时代在消极浪漫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之间作出了选择。但是，从《乡村》这类作品中对黑白、善恶的明确区分，我们也可以看出普希金早期诗歌中对古典主义的继承，从《罗切斯》，《给娜塔莎》，《哀歌》等诗中，可以看出感伤主义的情调。

### （三）

二十年代前半期是俄国浪漫主义继续发展的时期，也是普希金的思想与创作迅速成长的时期。但如果说1820年之前普希金的成长与时代相吻合，那么，从南方流放（1820年5月）时期开始，他的浪漫主义精神已与十二月党人有了本质的不同。他的思想认识已超越了时代。在创作上，他已开始对现实采取了真实的描写与批判的态度。在1820年到1824年之间，他创作的抒情诗仍有164首之多，但重点都转向了叙事诗的创作。正是在这方面表现了他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最初过渡。这几年来，除了最著名的四首“南方长诗”之外，他还写了宗教讽刺长诗《加甫利颂》和六首长诗的提纲和片断，并在童话和戏剧方面开始了最初尝试。

还在十二月党人对革命充满热烈的幻想之时，普希金已先尝受到了亚历山大一世镇压革命的苦果。二十年代初期，普希金的思想首先经历的是个人命运所带来的悲观失望（如《浪漫主义的悲歌》，《白昼的明灯熄灭了》），但是南方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环境（如与南社领袖彼斯捷尔和“第一个十二月党人”拉耶夫斯基的结交等）又使他增强了对自由的渴望和对革命的信念，《短剑》、《希腊的女郎》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失望与希望的交织，加上高加索奇妙自然风光增强了普希金的浪漫主义想象，并促使他到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中寻找相应的政治流放者的体验。他的绚丽的南方长诗便是由此而来的。

南方长诗的故事发生在异域风光的高加索、克里木、摩尔多维亚草原，它使诗篇染上浓烈的抒情色彩和浪漫主义气息，同时也给环境描写增添了现实主义因素。关于《高加索的囚徒》，别林斯基曾说它的主人公“……是那个时代的伪英雄……年青人特别钦佩他，因为每个人都能从他那里或多或少地找到自己的反映”。因此这个人物具有“典型性格”的特点，尽管还相当模糊。

1823年是一个急剧的转折。这时，欧洲的反动势力以及沙皇为首组成了神圣同盟，民主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镇压，转入了低潮。它使普希金的思想经历了否定主义的痛苦和绝望，从1823年下半年到1824年上半年就是普希金经历这种思想危机的时期。否定一切的痛苦和绝望虽说是短暂的，但失望和怀疑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并形成了他的新的思想和性

格。

普希金在思想和创作上的重大变化首先反映在《茨冈》和《叶甫盖尼·奥涅金》前三章的创作中，它们的写作几乎是同时（均在1823年）进行的。它们表明普希金已从浪漫主义的讴歌转向了研究和描写现实。但普希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创作中的变化，而是把它们看作浪漫主义的变体，并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称为浪漫主义的作品。直到1824年8月，南方流放结束后，他才开始有意识地克服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创作。

应该说，普希金这时进行的创作探索，已经脱离了十二月党人的影响，更富于独立性了，而在走向历史，走向人民，走向对现实的深入分析和批判方面，则具有更大的独特性，在这些方面，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阿乐哥表现出了普希金对当代人物的认识和批判，表现出了先进人物与社会矛盾，个人主义与原始性自然和谐的矛盾；而在连斯基身上则表现出了普希金对自身的否定。奥涅金和连斯基是“波浪和岩石，诗歌和散文，冰块和火药”，这虽然是不同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却也反映出普希金自身思想、性格发展的不同阶段。奥涅金后来杀死了连斯基，也就是普希金否定了自己的浪漫主义的过去。对于普希金说来，这段时期就是青春时期的结束和成熟时期的开始。

#### （四）

1825年至1830年是普希金创作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过渡的后期，他的创作中又出现了质的变化。

在米哈依洛夫斯克村，普希金不得不忍受更为孤寂，凄凉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却促使他更加勤奋的创作，并有助于他与人民的接近。对人民和生活有了更真实的认识，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创作方面。他在1825年写道：“我觉得我的精神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我能创作了”。在1824年8月到1826年9月这两年里，他思考了“人民”，“叛乱”和“自由”的问题，致力于忠实而客观地深入描写历史和现实。1825年，他写出了《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同时，还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四、五两章的创作。

《鲍里斯·戈都诺夫》是普希金深入研究和思考历史与现实的产物，也是他对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独特反映。他把俄国十七世纪看作所谓的“经典”叛乱时期，后来还说：“所有的叛乱都彼此相似”，认为历史不断向纵深发展，并随时提出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由于对历史和人民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已经看到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的必然性。他在1826年3月7日给茹可夫斯基的信中写道：“不论我的政治及宗教思想面貌如何，我都把它们留在我的心中，我不打算毫无理性地反对公认秩序的必然”。他认为只能由沙皇“从上而来”实行反农奴制的政策，而自己则要既不背叛对自由的信念，又能重新获得自由，从事写作，这就是他所以会和刚上台的尼古拉一世取得暂时的妥协，并在《斯坦施》这样的诗中表现出对政治持乐观态度的原因。1827年到1828年，他的创作继续转向历史题材，写出了历史叙事诗《波尔塔瓦》和第一部散文体小说《彼得大帝的黑教子》（未完），这些作品说明了他走向现实主义散文创作的趋向。

在尼古拉一世的黑暗统治和严格监视下，普希金的政治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的心情十分苦恼，加上对冈察洛娃第一次求婚的失败，使他更加渴望去看那些流放在南方的十二月党人，他亲密的朋友拉耶夫斯基等人。终于，他不顾尼古拉一世的禁令，在1829年3月到11月期间，擅自到高加索作了一番长途旅行。这次旅行对他的思想和创作的进一步转变有着密切的关

系。回到彼得堡后，他就把旅行中的随笔汇集成了《阿尔兹姆鲁旅行记》，它们也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即后来改为“旅行片断”的内容。就是在这一章里表现出，在普希金的构思中奥涅金已经有了新的未来。

## (五)

米哈依洛夫斯克的村居生活和阿尔兹姆鲁的旅行为普希金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构思，1830年4月他向冈察洛娃再度求婚成功所带来的喜悦和快乐诱发了他旺盛的创作激情，从而出现了“波尔金诺之秋”的美谈，在世界文学史中，这也是无与伦比的奇迹。1830年9—11月，这短短三个月中，普希金写了四个小悲剧（《吝啬的骑士》，《莫扎特与沙莱里》，《石客》，《鼠疫流行时的宴会》）；《别尔金小说集》的五个短篇小说（《射击》，《暴风雪》，《棺材店老板》，《驿站长》，《村姑小姐》）；两篇童话（《牧师与长工巴尔达的故事》，《母熊的故事》）；一篇诗体小说《科隆纳一家人》；三十多首抒情诗和许多评论短文，特别是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整个八、九章以及第十章的开始部分。

波尔金诺时期是普希金生活和创作中的最大转折。这是他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从诗人到散文家过渡的结束，他在这个时期的创作，清晰地显示出这种转折的特点。我们说，1824年完成的《茨冈》是他从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最初探索，1825年写作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是他在这条道路上的第一个里程碑，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完成则宣告了这一过渡的结束。

特别有意思的是：四篇小悲剧与《别尔金小说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看来普希金是有意如此创作的：四篇悲剧具有古典主义的特点，突出刻画人物的个性和欲望。而《别尔金小说集》则富于现实主义笔法，描写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和喜怒哀乐；前者的人物是非凡的，后者的人物是平凡的；前者的情节是西方的，后者的情节是俄国的；前者是古代的，后者是现代的；前者是诗体的，后者是散文的。以小悲剧为对照，更能显出《别尔金小说集》的民族、时代的现实意义。这部小说与《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及其后的《上尉的女儿》同样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文学史中常常将《驿站长》这篇小说称为划时代的杰作，认为它开创了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先河，实际上《别尔金小说集》的重大意义远不止此，《驿站长》中对老人萨姆松·维林的心理刻画和墓地那一场的景物描写，《村姑小姐》中如同风俗画般的鲜艳色调与温和的讽刺，《暴风雪》与《射击》中的悬念结构，以及西尔维涅的冷峻面貌和复仇心理，还有《棺材匠》中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虚构的结合等等创作手法和笔调，对后来俄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在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果戈理的《死魂灵》，《鼻子》，《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孪兄弟》等作品和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中，都不难找到异曲同工的继承痕迹。

总而言之，从1825年到1830年间（包括1830年9月—11月），是普希金从浪漫主义继续过渡到现实主义，从诗歌继续过渡到散文的后期阶段。从创作倾向看，普希金的抒情诗已更具有现实主义的性质，如《寄西伯利亚》，《冬天的道路》，《给乳母》等都是真实的人物和景物作为抒情内容的；至于叙事诗和戏剧则倾向于历史题材。他得注意的是，但从二十年代末就开始转向散文体小说的创作，这些小说多半都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同时还带有浪漫主义的成分。

## (六)

从三十年代一开始,普希金就完全进入了新的创作阶段——现实主义的散文创作阶段,尽管他依然还在写诗,但这时他的诗歌也主要是现实主义性质的了。从1831年到他逝世为止,他的抒情诗只有约125首,叙事诗也减少了,只有《安哲鲁》,《铜骑士》,片断的《耶热尔斯基》和《尤吉弗》,在戏剧方面也只有《骑士时代的几个场景》(未完),《美人鱼》(1829—1832)和几个粗略的提纲、片断。这样,当然如象别林斯基所说,“普希金已经不存在了”。然而普希金却在散文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才华,而这些作品,大多数别林斯基都未能看见。在三十年代,普希金写的小说有:《罗斯拉甫列夫》,《杜勃罗夫斯基》(未完),《黑桃皇后》,《基尔查理》,《埃及之夜》(未完)和《上尉的女儿》。在童话方面,他又写出了《沙皇沙尔坦的故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死公主的故事》,《金鸡的故事》以及三个片断。

三十年代,欧洲文学已经完全进入了现实主义时期,主要表现在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等人的创作上,但浪漫主义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象巴尔扎克的《朱安党人》,《驴皮记》就带有不同性质的浪漫主义成分。而在俄国,如果就现实主义的情节内容和人物而言,《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开始于二十年代中期,比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小说都早,但是就体裁而言它毕竟还是“诗体小说”,只能看作散文体小说的先导,普希金的纯粹的散文体现实主义小说只有《驿站长》这一篇,它与在1830年同年出现的巴尔扎克的《高布赛克》和司汤达的《红与黑》无论在描写现实社会的幅度和反映现实的深度上都不能相提并论。普希金的这篇小小说的风格直到四十年代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发展。而三十年代还是整个俄国文学从浪漫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带有积极浪漫主义成分,如象巴尔扎克的《朱安党人》一样,这种现实主义小说在内容,情节,结构和描写上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理想性,其情调往往是明朗的,乐观的,或是悲壮的。由于现实生活不可能符合作家的愿望,因而这类作品往往只能取材于历史或虚构,其现实主义因素主要在于历史事实和人物的真实,或者对现实生活、景物描写的真实。普希金的《村姑小姐》,《暴风雪》,《射击》,《杜布罗夫斯基》,以及《上尉的女儿》都属于这类作品。另一种作品则带有消极浪漫主义的成分,诸如巴尔扎克的《驴皮记》一样,这类带有传奇性或神怪性内容的小说,三十年代在俄国也很流行,这是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小说,尽管它带有神奇的、幻想的浪漫情节,本质上都是对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的,而且其人物和环境描写也基于现实生活,这种作品的色调往往是阴暗的,悲观的,神秘的,具有对未来寄予朦胧的理想和道德寓意性。普希金的《棺材匠》,《黑桃皇后》,以及叙事诗《铜骑士》都是这类作品,而果戈理的主要小说如《外套》,《鼻子》,《肖像》,以及《死魂灵》也都是脱不出这个范畴。

《上尉的女儿》是一部历史小说,别林斯基称之为散文体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在这部小说中,普希金突出刻画了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布加乔夫的英勇、豪迈、机智和天真,格利乌夫的宽厚、忠诚和勇敢,玛莎的朴素、端庄、坚定和真诚,这个形象的内在美质不下于塔吉雅娜。整部小说的中心思想可以归结为“人格”二字,小说的题词就是“自幼要珍重人格”普希金充分表现出了农民领袖布加乔夫,贵族军官格利乌夫和俄罗斯妇女的人格美,第八章中布加乔夫和格利乌夫单独对话可以说是一场人格的搏斗,表现得也十分真实。小说的文笔十分优美,完全体现了普希金创作风格的真实、自然、简练和纯净,对暴风雪的描

写历来被视为俄国文学中自然景色描写的典范。这部小说的高度成就使它成了俄国现实主义散文的第一个里程碑。

《黑桃皇后》具有深刻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心理内容。小说的主人公格尔曼是现实中的人物，也是新兴的资产者与掠夺者的形象，他的座右铭“精打细算，节制，勤勉”说明了他的性格，而对孤苦的少女丽莎维塔的欺骗则说明了他的品质。他的这种性格、品质和对金钱的贪婪对当代人的心理具有社会典型性，而主人公的毁灭则表现出了金钱的罪恶，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这个形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十年代，在转向现实主义散文的同时，普希金并没有停止写诗，但他这时的诗歌主要已经是现实主义性质的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叙事诗《铜骑士》。我们说过，普希金后期创作主要转向了历史题材，但他的写作历史小说和著作，并不单单是为了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他的目光始终凝视着现实。在这方面，《铜骑士》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是一部非常特殊的作品，它反映出了普希金在生活的最后几年中对国家的历史和人民命运的思考。

普希金整个一生都是随着时代前进的。他的创作构思与风格都是由时代和社会决定的，他既不落后于现实，也不超越现实，而是在创作中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真实风貌。他之所以能够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因为他具有这种现实主义者必不可少的素质，也因为他本人就是当代俄国社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三十年代的普希金已经超过了富于幻想和热情的年龄，而且看到了贵族革命的结果。饱经忧患的生活使他更为成熟，也更为冷静了，但是都没有使他消沉。他以富于洞察力的目光注视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对现实、历史和人民进行着深入的研究，在创作中继续努力地探索、追求，然而却在风华正茂的壮年夭折了，这就是我们在他的创作中只看见了别尔金和格利乌夫，却没有能够重新看见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原因。